

中山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南嶺歷史地理叢書

廣西恭城碑刻集

劉志偉 主編
鄧永飛 江田祥 杜濤海 莫紀德
整理輯錄

SPM

南方出版傳媒
廣東人民出版社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廣西恭城碑刻集

劉志偉 主編

鄧永飛

江田祥

杜樹海

莫紀德

整理輯錄

SPM

南方出版傳媒
廣東人民出版社

· 廣州 ·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廣西恭城碑刻集 / 劉志偉主編, 鄧永飛等整理輯錄. —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218-10692-2

I. ①廣… II. ①劉… ②鄧… III. 碑刻—匯編—恭城瑶族自治縣
IV. ①K877.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5) 第 311774 號

GUANG XI GONG CHENG BEI KE JI

廣西恭城碑刻集

劉志偉主編 鄧永飛等整理輯錄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 瑩

責任編輯: 盧家明 錢 豐

責任技編: 周 傑 黎碧霞

封面題字: 謝 湜

出版發行: 廣東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廣州市大沙頭四馬路 10 號 (郵政編碼: 510102)

電 話: (020) 83798714 (總編室)

傳 真: (020) 83780199

網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珠海市鵬騰宇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張: 31.5 插頁: 2 字數: 640 千

印 數: 1—1200 冊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200.00 元

如果發現印裝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與出版社 (020-83795749) 聯繫調換。

售書熱線: (020) 83790604 83791487 郵購: (020) 83781421

本書是香港中文大學——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承擔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項目協作研究金計劃「重構西江：明清帝國的建構與土著社會的演變」，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卓越學科領域計劃（第五輪）「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之研究成果。出版獲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資助。

叢書學術顧問

葛劍雄

唐曉峰

劉志偉

郭聲波

陳春聲

辛德勇

叢書編輯委員會

吳滔

于薇

謝湜

天地所以隔外內

劉志偉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我生在南嶺，長在嶺南，對南嶺有一種特殊的情感，我從事研究和教學時腦子裡冒出的很多問題意識和學術觀點，也得益於在這片山地的生活經驗。因此，當我看到身邊幾位從事歷史地理研究的年輕同事要在南嶺做一番研究，自然要湊過去探頭窺望一番的。儘管坊間有「觀棋不語」的規誡，但觀棋之人總是自己沉溺局中，雖不能左右棋局，却欲言難止，觀戰一輪，忍不住就要發一點議論，希望不會被棋局中人轟走。

壹

所謂的南嶺，一般認為是「五嶺」的別稱，在我的印象中，歷史文獻上多見的名稱是「五嶺」，而當代更習用「南嶺」之名。按照比較通行的說法，「五嶺」由大庾嶺、騎田嶺、都龐嶺、萌渚嶺、越城嶺五座山嶺組成。不過，這五座山嶺其實並不是一個整體上延綿相連的山脈，而是由湖南、江西進入嶺南地區的五座峻嶺為主體構成的山脈的合稱。這幾座山嶺大致上呈東北—西南走向，再東西一列排開，連成一個獨特的山脈系列。在歷史上，關於「五嶺」的說法并不一致，如屈大均所言，「大抵五嶺不一，五嶺之外，其高而橫絕南北者皆五嶺，不可得而名也」。^{〔一〕}歷來關於「五嶺」的不同理解，恰恰表明了在眾人觀念中，「五嶺」只是一個籠統的名稱，泛指湖南、江西與兩廣之間這片山地。「其高而橫絕南北者」這層含義，並不是「五嶺」二字在字面上的意義所能涵蓋的。今日人們多用南嶺而少用五嶺之名，庶幾亦為此故。

古人以「五」來指稱這個山地，很可能與秦分兵五路入嶺南的歷史有關。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羅列了文獻上關

於「五嶺」的不同說法，其中引宋人周去非的見解頗值得注意。周去非《嶺外代答》云：「自秦世有「五嶺」之說，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嶺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之汀，入廣東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踰大庾入南雄，一也；自湖南之郴入連，三也；自道入廣西之賀，四也；自全入靜江，五也。乃若漳、潮一路，非古人嶺之驛，不當備「五嶺」之數。桂林城北二里，有一坵，高數尺，植碑其上曰「桂嶺」。及訪其實，乃賀州實有桂嶺縣，正爲入嶺之驛。全、桂之間，皆是平陸，初無所謂嶺者，正秦漢用師南越所由之道。桂嶺當在臨賀，而全、桂之間，實「五嶺」之一途也。」^[1]這個說法，毫無疑問與今天習用的「五嶺」定義不符。我們沒有必要糾纏於這個說法有多少合理性或正確性，作爲地理概念的「五嶺」，當然應該是「指山名之」，周去非以「入嶺之途五」理解之，可謂別有深意。我們所以重其說，乃由此得知北人之觀「五嶺」，以「中國」出嶺外爲視角，此爲理解「五嶺」或「南嶺」作爲一種地理概念的文化意涵之關鍵。在這樣一種觀念之下，南嶺作爲一個地理區域的範圍，當不應因五嶺間各不相連而壞其完整之體，亦不必以五嶺本身山脉延綿之界域爲局限。由周去非之說所得廣義之南嶺概念，向東伸展與武夷相接，向西接雲貴高原，向南延綿與九連山一體，向北則同羅霄山脉相連。此種認識，與南嶺在文化意義上的區域概念相通。我所理解之「南嶺」，亦當爲此廣義之域。

從「中國」出嶺外的角度看，南嶺爲「中國」出嶺外之天然屏障，這恐怕從來不存在歧見。兩粵既爲「嶺外」，被中土之人目爲蠻夷化外之地，數千年來未有真正改變，《水經注》言：「古人云：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會貞按：《漢書·嚴助傳》載淮南王安上書，諫伐南越，曰：越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天地所以隔內外也）。況綿途於海表，顧九嶺而彌邈，非復行路之徑阻，信幽荒之冥域者矣。」^[2]嶺北與嶺南，無論氣候、風俗、語言、人群，自古至今，均有明顯差異，此乃有待詳論而明之常識。其分隔之屏障，自然是層峰疊嶂之南嶺群山。

然而，屏障未必是天塹，南嶺山地的地形構造，特別是由多個較小規模的山脉東西并行排列的格局，崇山峻嶺之間又分布着多處相對平衍的丘陵，形成多處嶺北、嶺南間交通之孔道。最重要的是，在南嶺北部，通往長江的有湘江流域的湘水、瀟水、耒水，贛江流域的貢水、桃江、章水；在南嶺南部，西江流域的桂江、賀江，北江流域的連江、武水、潯水，東江流域的尋烏水、定南水，韓江流域的石窟水、汀江等多個水系，直接把南嶺接到南海。這些長江流域與嶺南的南海週邊地區連接起來大致呈南北走向的水道，均深入到南嶺腹地，而且嶺南、嶺北之間的水道在山脉間交錯，彼此相隔的分水嶺上的陸路交通相對便捷。如果我們相信行政區的邊界劃分多是基於交通條件形成的話，還可以看到，在全州、郴州、贛州、汀州等段都存在省的界域與流域界域犬牙交錯的情況，這也多少反映出南嶺地區的地理特點，這種交通條件，使得南嶺這個南北相隔的天然屏障，同時也成爲南北人群交往和商品流通的孔道。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中就有許多處描述了南嶺作爲分隔嶺外屏蔽的同時，也是南北往來門戶的狀況。

必須強調的是，經由南嶺山地的南北交通，并非簡單地只是把同一經濟體系中的兩個地區聯繫起來，更是連接環南海地區和中國大陸兩個世界性區域的紐帶。明人王臨亨在《粵劍篇》中記錄行經南嶺的經歷感受時說：「二日早發南安，平旦度梅

嶺。其陰，石徑蛇行，屈曲而多委；其陽，峭壁林立，深秀而多致。要皆平坦靡咫尺，險隘足困客趾者。憶余嘗由金華過括蒼，度一嶺，高險倍之，而以僻，故其名不傳。此嶺獨以橫截南北，為百粵數千里咽喉，犀象、珠翠、烏綿、白氈之屬，日夜輦而北以供中國用，大庾之名遂滿天下。山河大地亦自有幸不幸耶！」^{〔四〕}這段話非常貼切地道出了南嶺的特殊地理角色。在中國版圖上有許多山脉或山區也都是溝通南北東西的咽喉，而經由穿越南嶺的交通孔道運送的商品不僅數量規模龐大，而且這種流通是南海與內陸之間的物資流動、人員交往以及由此產生的文化交流。在這樣一種宏觀交通格局下，南嶺內部山嶺間還有一個縱橫棋布的交通網絡。如屈大均下面這段議論所描述：

予嘗謂：昔稱五嶺以人迹所絕，車馬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故尉佗絕新道，拒三關，而盜兵即不得至。今梅嶺之旁，連峰迭嶂間，小徑紛紜，束馬懸車，縱橫可度，雖使千夫捍關，萬人乘塞而潛襲之師已至雄州城下，又況郴之臘嶺與連之星子朱岡，皆可以聯鑣徑入乎。^{〔五〕}

這種情形，在整個南嶺山地皆然。如此地理大勢，伴生着一種重要的地形地貌特點，在萬山中分布着無數大大小小的盆地或平崗。這些盆地土壤肥沃，水源豐足，有很好的生態條件，可以容納很多人口居住、墾殖。至於小盆地、峽峒和平崗，在南嶺地區更是星羅棋布，加上山嶺間大小河溪蜿蜒穿流形成的河谷，具有良好的水源和土壤條件，可以為相當規模的人口提供適宜生存的生態空間，南嶺山地由此成為大量人口以聚居或散居形態棲息之地。從局部看，這些人群的棲息之地與外界為山嶺阻隔，但從南嶺山地的整體來看，這又是一個由四通八達的交通綫和商品集散地構成的具有整體性的區域體系。

貳

我們把南嶺視為一個作為學術研究對象的整體性區域，首先要面對的，是以往學界形成作為研究與分析單位的種種區域概念。無論是以行政區還是以經濟區、文化區來劃分的區域，南嶺都處在這些區域的分界交疊的位置。就行政區而言，南嶺連接着湘贛粵桂閩數省；以學界熟知的施堅雅提出的經濟大區劃分來說，南嶺的南北分別屬長江中游區域與嶺南區域，東西則連接着東南沿海與雲貴高原。施堅雅的區域劃分，建立在由人們的交易活動形成的市場網絡層級體系之上，大區以在市場層級體系中高層次市場中心所在的江河流域和盆地為核心，周邊則由大河流域的分水嶺構成各大區的邊緣。顯然，如果把南嶺視為一個整體性的「區域」，在概念上與施堅雅的市場體系模型下的「區域」截然不同。

然而，施堅雅基於市場層級體系建立的區域模型，對於以區域研究方法來認識中國歷史的意義，不在於其區域劃分在形式上有多少合理性和多大的適用性。學界的關注多放在他的市場和區域模型的抽象結構形式上，而忽視了他構建中國區域體系的

方法在認識論上的啓示。我認為，施堅雅建立的分析模型對我們的啓發，不應該只局限在從市場行為出發去建立區域層級體系的方法，無需生硬地把他所建立的區域模型直接套用到所有的研究之中，施堅雅建立中國區域體系的方法，捨棄了從王朝國家政治版圖或行政轄區出發的邏輯，提供了一個從人的行為出發去解釋和定義區域的範例。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所建立的區域模型，「是一個地方和區域歷史的網狀交疊層級體系（an intermeshed hierarchy）」，這些地方和區域的範圍分別以人之互動的空間結構（the spatial patterning of human interaction）為依據。」他作為分析出發點的「人」，是具有經濟理性的人。如果我們在這個層面延續施堅雅的邏輯，以「人之互動的空間結構」為理解區域的方法，擴展研究視野，從人的非經濟理性行為和經濟理性行為交織的各種歷史活動着眼，就不難明白，國家權力的擴張與抵抗、人口的空間流動、生態的適應與改造、族群的文化互動等等的歷史過程，可以形構成不同的「網狀交疊層級體系」。

在這樣的認識下，南嶺雖然在施堅雅模式中處於幾個經濟大區的邊緣，區域內幾乎沒有真正的區域中心城市，套用不了施堅雅的市場網絡的層級結構，但在這個邊緣地帶的山嶺中生活的人群，在山地生存和族群交往中長期持續的文化互動，令南嶺整合為一個具有某種地理和文化上的整體性的區域。這個區域南北溝通海陸華夷，東西串聯漢壯瑤畬，四周與幾個經濟大區相接，局部的封閉性與整體的開放性并存，構成南嶺作為一個整體性區域的特質。

這樣一種關於南嶺區域的觀念，可以聯繫到費孝通先生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下「南嶺走廊」的概念。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費先生提出中華民族的分布地域可分為北部草原區、東北高山森林區、青藏高原區、雲貴高原區、沿海地區和中原地區以及藏彝走廊、西北民族走廊和南嶺走廊。費先生提出這個由六個區域板塊和三個民族走廊構成的空間格局，雖然是從民族分布着眼，以已經形成的民族單位為基礎劃分的，但是他強調這些民族分布的形成，是經歷了多種人群的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的過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形成了以民族分布呈現出來的區域。表面上看，民族走廊的空間模式與施堅雅的區域模式截然不同，但這樣一種從人群的互動形成空間認知的取向，從人的行為出發去建構區域範疇，與施堅雅的區域模型在認識論上其實也可以相通，只是施堅雅主要從人的經濟理性行為出發，而費孝通則主要從人的文化認同形成着眼。我們可視為中國社會與歷史的區域研究的兩種可以互補的區域空間認知範式。

承接著施堅雅與費孝通提出的區域模型在認識論上的邏輯，我們把南嶺視為一個具有某種整體性的研究區域，就不必建立另一種區域模型去取代他們的區域理論，而可以在他們的模型基礎上，疊加上從人們的不同行為和活動出發構成的地圖，從這些不同的空間圖層之間的疊合與互動入手展開研究。我們需要建立的空間構想，不是一個單一圖層的區域地圖，而是由多層地圖疊合互相滲透與干擾形成的區域圖層。

通過具體的研究實踐體現出這種追求的一個範例，是梁肇庭教授在客家研究中建立的空間概念。⁽⁵⁾他從施堅雅的區域理論出發，導出了一個與施堅雅的區域劃分不同的客家區域，這個區域，大致相當於二百年前惠州豐湖書院山長徐旭曾所描述的範圍：「西起大庾，東至閩汀，縱橫蜿蜒，山之南，山之北，皆屬之。即今之福建汀州各屬，江西之南安、贛州、寧都各屬，廣

東之南雄、韶州、連州、惠州、嘉應各屬，及潮州之大埔、豐順，廣州之龍門各屬。」^[5] 這個區域大致覆蓋了南嶺中部、東部及其與武夷山脉連接的地區和向北延伸到羅霄山脉的山地。不過，至少在十八世紀以後，客家人和客家話的分布一直延伸到了大庾嶺以西至廣西東北部地區，也就是說，實際上客家方言群的分布覆蓋了以廣義南嶺為核心并向東北延伸的山地區域。梁肇庭的客家研究顛覆了羅香林關於客家源流的成說，把客家源流和客家族群意識形成過程，置於施堅雅模式下的區域體系的空間過程去解釋。他從施堅雅建立的大區模型出發，將「客家」的歷史同施堅雅的大經濟區域的周期發展聯繫起來。在施堅雅的區域體系中，大區劃分主要是以江河流域和盆地為基礎的，而形成客家共同體的山地則覆蓋在幾個大流域的分水嶺之間，亦即不同大區的邊緣。梁肇庭教授以「客家」為一個「整體」的研究對象，儘管他的討論本意是要發揮施堅雅的區域體系理論，但實際上已經勾勒出一個疊加在施堅雅的區域地圖之上的區域圖層，這個區域跨在以流域和低地為核心的大區之間。在這個區域里，生活在跨區域邊緣地帶的山嶺中的人群，在與各大區的核心地帶互動過程形成自己的互動空間與文化認同，在此基礎上，這些人群整合為一個有很強認同感的族群，在空間上也形成一個具有自身特質的人文地理學意義的區域。不難看出，由這種論述的邏輯發揮下去，就有可能導出一種以南嶺山區地貌為基礎，由山地與谷底間的人口流動、國家擴張、族群互動和文化認同形成的區域概念，進而建立一個由多種網絡錯綜疊合的空間模型，并由其交織互動過程去演繹區域的歷史節奏，拓展和深化施堅雅建立的以區域週期解釋中國歷史的解釋。

梁肇庭教授在客家研究中採取的這樣一種從跨區域邊界人群的流動和互動去解釋區域認同形成的分析方法，是在既有的區域知識架構下從邊緣與中心的互動過程來展開的。如果說這實際上還沒有真正走出既有的區域研究的「核心—邊緣」分析模式的話，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歷史學家 Willem van Schendel 教授近年來提出的 Zomia 地區的地理概念，推進了在學術研究領域中關於「區域」的認知。Schendel 教授提出，「區域」是一種把特定社會空間以及特定的分析規模具象化和自然化的地理隱喻，區域研究在產生出人們所了解的特定地理單位的同时，也製造了學術視野之外的地理單位。區域研究的特定結構，形成一種區域的中心與邊緣的認知模式，從而在認知上形成一個特定區域與特定的知識類型的週緣地帶。以往，這種處在各區域之間的邊界地區常常只被視為中心的邊緣，沒有以其獨特的學術價值進入研究者的視野。然而，當我們要分析跨境流動的時候，以國家或區域作為研究單位就受限於規模的不適應，除了流動本身不會局限在這樣的規模之外，在流動規則方面的競爭狀態也一直持續不斷地影響着地理單位規模的變動，並改變其相對的重要性，甚或創造出全新的地理單位。於是，「過程地理學」在邊界地區最能够得到顯現，研究者由此得以跳出區域的規模，發展出一種新的區域空間的概念。他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形成的東亞、東南亞、南亞和中亞幾個區域之間的邊界相連地區命名為 Zomia，建立起一種由幾個區域的邊界地區相連而成，以區域間的政治過程以及跨區域的人群、物資、知識的流動構建的知域。^[6]

這樣一種由跨區域的邊界和流動去建立地區空間概念的歷史人類學研究取向，我相信可以在南嶺研究的實踐中得到很好的體現。前面我指出了南嶺山地既是天地所以隔內外的分界，又是溝通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通道，這個區域間的人群和物資以

及文化與知識的跨境流動，是形成南嶺社會與文化特質的基本動力，也是研究者認識南嶺歷史與社會的着眼點。在這樣一種視角下，南嶺就不僅簡單地是同一政治體系中的兩個地方性區域之間的邊界，而是一個多類型和多層次的空間流動交疊形成的區域。南嶺以南，是環南海區域的北部，流入南海的珠江以及鄰近幾條小江河，把南嶺山脉延伸至海岸的一片陸地，與南海海域連成一個地理上具有整體性的區域。這個地理板塊在自然地理、生態環境、交通條件、人群流動與分布等方面屬於學界稱之為「亞洲地中海」的世界性區域。而南嶺以北，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屬於中華帝國的核心版圖，由南嶺流出的多條江河把南嶺與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湖區連接起來，成為「九州」的組成部分，南嶺由此與帝國核心區連成一個整體。雖然秦始皇和漢武帝成功地把嶺南納入帝國版圖，環南海地區的北部（甚至部分的西部）地區由此也成為帝國版圖內的邊緣地區，但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南嶺兼具帝國邊緣與環南海邊緣地區的角色一直在延續。在南嶺以南地區，環南海周邊的文化淵源延綿長久，人群和文化也一直沒有脫離環南海區域的深層影響。劉安《淮南子·原道訓》云：「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短絁不袴，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這類描述清晰地記錄了南嶺以南雖然已經納入漢朝版圖，但生活在這裡的人群相對於南嶺以北的人來說仍屬異類。又《史記·貨殖列傳》記：「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則顯示出嶺南對於中國的意義在於提供中原地區所缺而王朝國家所需的南海週邊地區獨特物產。因此，如果我們從界域與流動的角度去研究南嶺，首先要在由環南海地區為核心的「亞洲地中海」與由黃河、長江流域為核心的中華帝國兩個世界性區域互動的層面上把握。所謂「天地所以隔外內」，就是站在「中國」中心的角度看，這兩個區域的邊界，分隔了「內」與「外」地區，這個內外之間的人與物的流動，構成了南嶺歷史的基調，南嶺地區的文化特性、社會形態、族群互動、政治格局、經濟活動，綴成一個個色彩斑斕的樂章，而南嶺之所以能够構成一個作為研究單位區域，也是在這個基調下演繹出來的。

叁

在這樣一種理念下，我們研究的出發點，首先是跨越這個邊界活動的人。出入於南嶺山地的人，既有持續不斷從「中國」向南遷移的人，也有環南海圈裡流動着的形形色色的人。他們在南嶺的進進出出，或者面對生存和競爭壓力在山地間的移動，以及由此引出不同人群之間的互動，展開了南嶺的歷史的長卷，這一幕幕歷史形塑出南嶺的社會構造與文化特質。另一方面，作為帝國邊緣的南嶺，其歷史始終在帝國擴張的大背景下展開。這個「帝國」，既是一種政治力量的延伸，王朝國家通過設立軍事與行政機構，向南嶺伸進，在這個區域建立國家統治的秩序，同時也是一種「文明」的滲透，通過文字與教化的推廣來實現。這個人群流動和國家擴張交織的歷史過程，在由南嶺連接起來的兩個區域體系之間的物資和知識的流動中展開。

以往對於邊緣地區的歷史認識，是王朝國家歷史主導下，由中心向邊緣張望的觀察，因而在人們熟悉的宏大歷史敘事中，南嶺的歷史幾乎是完全沒有位置的，最多也只是一種邊緣對中心的配合或回響。然而，當我們以這種跨界區域作為研究的單位，

就可以期望從這種連接多層區域的邊緣地區的歷史中引出一些新學術關懷，提出新的問題，發展出新的研究路徑，並獲得有自身學術價值的歷史認識。由於我們對南嶺歷史的研究還剛剛開始，現在要討論這個方向可能發展出哪些新的方向，還為時過早，這裡就我對南嶺歷史的一些皮毛認識，提出一些最輕率的想法。

既然南嶺的歷史是由進出於南嶺山地的人群的活動構成的，那麼，這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在這片跨區域的山地通過怎樣的行為機制形成本地的區域社會與文化，是南嶺歷史研究的一個基本問題。在這一點上，臺灣研究的經驗或許是有益的。臺灣人類學者以臺灣漢人社會為對象的研究，提出了理解區域社會的三種理論假設：第一種是強調歷史文化傳統重要性的假設和解釋，第二種是環境適應的假設和解釋，第三種是族群互動與文化接觸的假設與解釋。^{〔九〕}莊英章教授在討論臺灣的客家學建構時，明確提醒要走出種族中心論的視野，從族群互動、認同與文化實作的角度，尤其是採取貫時性的歷史社會變遷的角度來研究。^{〔一〇〕}在漫長的歷史中，來自不同地區的人持續地進入南嶺山地，並且頻繁地在山地間的流動，是南嶺歷史的一個主題，以往的歷史觀常常把這種人群的移動視作移民史和開發史的課題。毫無疑問，由人的流動和流動的人的活動構成的歷史，的確可以從移民的角度來觀察，但我們更值得去深入探究的，不應該只停留在人的空間移動上，這些人來源的複雜性及其文化傳統的多元化、移動時間的持續性和週期性、多種方向甚至看似無序的流動路徑、在不同歷史時刻外來者與相對而言的土著之間的互動、以及在這些過程中文化認同形成機制等等，都可以令我們超越移民史的視角，轉向為由人與物以及文化的流動和互動去建立關於區域社會建構的認識。在一個以戶籍制度作為王朝國家統治體制基礎的社會體系中，那些持續不斷地進入南嶺的人口，原來已經是國家編戶的，與其說是移民，不如說是逃戶；而隨着南海北部各河口三角洲和在山區間的河谷盆地被王朝國家深度滲入，那些南嶺的山地自然成為那些自居化外的蠻僚最後棲息的家園。於是，山地人往往不是沿着江河流域，而是沿着山嶺高地或在山崗間移動。他們的流動方向大多是散漫且多向度的，有的甚至是在山地間的無序流動，有從山地之外向山地流動，也有走出山地向外移動。這些本來在歷史文化傳統上有很大差異性的人群，在流動中彼此之間發生頻密的互動。在同一種生態處境中，這種流動和互動的過程，逐漸釀成了文化上的共同性，也形成了新的分類。南嶺山區中正在消失中的方言島現象，以及我稱之為南嶺山地普通話的「客家話」的形成和空間擴展，就是這個事實的一種折射。

要更加深入了解這個過程，我們需要在山地生態環境及其人們生存方式的影響，山地人群應對王朝國家統治的策略及其行動，還有山地的市場體系以及人群的市場活動等方面進行深入研究。以市場為例，如果套用施堅雅的市场模式來看，南嶺山地的市場，在層級結構上比較單一，稀疏的市場中心所覆蓋的市場區，範圍遠比平原地區的廣大，甚至還往往同時兼具了從基層市場到中間市場和中心市場的功能，並且直接同更大的區域性市場連結起來，這導致了山地居民相對於平原地區的鄉民有更廣闊的市場活動空間。這對於山地人群的族群性和文化認同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一種機制。至於這樣一個本地的物產（尤其是礦產）以及本地市場的交換流通，與南嶺作為前面所說的跨區域市場流通的通道之間的關係，我們所知甚少，但可以想象，跨區域的物資流動和人的交往，把不同的人群源源不絕帶入南嶺山地的同時，也必然拉動更大規模的區域範圍的文化交流。

雖然目前南嶺地區的考古發現和社會調查的成果還有點零碎，但已經讓我們可以看出多元文化的長期影響。考古學者卜工先生從考古學的角度討論嶺南的文明進程時，概括告訴我們，先秦時代，南嶺以南有獨立的考古學文化，與南嶺以北地區截然區分，所以蘇秉琦先生曾說「嶺南有自己的夏商周」。卜工先生認為，在石器時代，在南嶺以南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具有相對獨立和穩定發展時期，有一個「珠江的大傳統」，在文化淵源和傳統上與南嶺以北的中國迥然有別。這個「珠江的大傳統」在珠江下游、粵北山地和沿海地區，有着文化面貌的一致性，也存在他表達為「南北對話」、「海陸有別」的多樣性。後來，南嶺以北的文化不斷通過南嶺進入珠江流域，「距今6000年前後，湖南安鄉湯家崗遺址的彩陶由湘水走靈渠而入西江，然後一路南下……開始動搖了珠江的大傳統」，「距今5000年前後，江西清江流域的樊城堆等遺址以三足盤鼎代表的遺存與浙江好川墓地以陶鬻、玉琮為代表的遺存重組後翻越大庾嶺梅關進入廣東，取大珠江傳統而代之，以石硯文化的嶄新面貌獨立於粵北山地」；「距今3500年以後，福建九龍江流域以虎林山遺址為代表的遺存不斷地由東而西滲透嶺南」。⁽¹⁾考古學者的這些意見，在具體的表述上不管是否精確，都可以讓我們看到南嶺作為南北通道，在文化傳播、流動以及交互影響過程中的角色，而石硯文化的例子也顯示出多元文化傳統在南嶺這個通道上重新整合形成新的文化類型的可能性。

在文字傳統方面，我們今天在南嶺人羣中可以看到各種與文字傳統多重相關的文化遺存，例如瑶族、畬族的盤王傳說、過山榜、家先崇拜與祭祀、師公的儀式、親屬稱謂以及婚姻形態、家族制度、聚落和建築的風水傳統、以客家話為主體的漢語方言、女書文字，乃至漢文書寫的契約文書、族譜、碑刻等等，都是不同的文字傳統持續不斷在這裡滲透，並與非文字傳統交互整合的結果。特別要強調的是，我們在這些文化遺存中看到的文字傳統，並非單一的是王朝國家和儒學傳統的士大夫推廣教化的過程，在日常生活中的本地文化傳統中，文字的應用和傳播，對南嶺山地社會產生更長期持續深入的影響，顯然來自佛教和道教以及各種民間宗教傳統的傳播和扎根。

當然，南嶺北部的王朝國家及其文化長期持續的滲入、控制和整合，國家制度的存在和王朝歷史的節奏，對南嶺社會、文化與歷史有着最深遠的影響。與南嶺西北更廣袤的山地相比，這裡自從納入中國版圖之後，就不再是被視為王朝的邊疆。雖然南嶺東西兩翼在相當長的時期裡，也處在國家控制相當薄弱的狀態，但由於越過南嶺直接達到的桂林—廣州的地帶在王朝體系中長期具有很強的核心性，穿越五嶺南北的交通相對而言也相當便捷，歷代王朝都在南嶺地區設立州縣直接管轄，所以，中國的王朝國家的存在，是研究南嶺社會文化歷史時首先要確定的事實。正是這個事實，與南嶺以南地區在地理上屬於環南海區域的事實疊合在一起，使得國家在南嶺的存在以及國家力量在南嶺社會的整合過程及其影響都表現出複雜性和獨特性。

在南嶺及其以南地區，一方面是中原王朝在廣州、桂林這樣的都會建立起王朝政治控制的區域中心，沿着主要交通路線，國家也很早就設立州縣管治；另一方面，在中心城市以外的地區，長期居住的人口大多數是本地土著蠻僚。這樣一種國家沿着交通綫設立行政中心，而政治權力又不能真正覆蓋地理版圖上的大部分的平面空間的情況，在王朝時期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南嶺交通綫的變化以及戶籍人口分布的改變，可以反映出這種狀態下的國家存在及其歷史動態。例如由中原入南嶺的主要交通

綫從漢代的靈渠到唐代以後的大庾嶺的轉移，就顯示出南嶺與國家歷史動態的聯繫；從南嶺向南延伸的山地，控制着溝通嶺南東西部的的大藤峽和羅旁地區在明朝中葉受到王朝異乎尋常的重視，是王朝政治控制轉變的一種反應；在南嶺中部的粵北地區的戶籍人口，從宋代以前為嶺南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到明以後變成人口最為稀疏的地區，也是王朝國家的空間格局改變的結果，更隱含着國家在地方社會的存在形態在明代中期以後發生重大轉變的意義；明朝中期以後國家在南嶺的存在最重要的轉變，則突出體現在南嶺巡撫的設立以及在這個區域的政治版圖的顯著改變上。僅從這些既有的歷史認識，我們已經可以看到王朝國家擴張歷史在南嶺區域社會整合過程中的角色，國家的歷史毫無疑問是南嶺研究中的一個基本向度。

如果我們把這樣一種國家歷史的向度，拉回到南嶺當地發生的歷史的視角，也許最為引人矚目的事實，是長期持續的叛亂傳統和族群分類形成。叛亂和族群問題，是南嶺中最為外界關注的歷史，文獻上有關南嶺的資料，幾乎絕大部分都是關於這兩個題材的記載。我們可以相信，叛亂和族群互動，是形塑南嶺社會文化特質最重要的機制之一。在南嶺地區叛亂與族群的歷史中，很鮮明地反映出南嶺作為中國的王朝國家和環南海地區的跨界角色，凸顯着這兩個區域政治與文化互動的特質。例如，在南嶺以南地區的叛亂勢力，往往是山盜、海寇一體，海寇上山或山盜下海，成為很多大規模叛亂的活動方式，在官府的眼中和文字書寫的歷史記載裡，這些叛亂往往都打上族群的標記；在一些人的觀念上，甚至逐漸形成上山為瑤，入水為蛋的分類成見。這些現象，都體現了南嶺跨區界域的特色。叛亂作為對國家政治權力的反抗，而族群則往往是一種對主流文化認同的抗拒，兩者交織的關係，不可避免地總是我們觀察南嶺歷史的主要內容。討論到這一點，也許我們可以把南嶺研究聯繫到近年來學界關於前述 Schendel 教授稱為 Zomia 地區的研究時提出一個熱門話題，就是從山地人群「逃離國家」的選擇去解釋像 Zomia 這類跨界邊緣地區的歷史與社會形態。在這個問題上，我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借這個機會再多談幾句。

肆

「逃離國家」的話題，是由 James Scott 教授在關於 Zomia 地區歷史的研究中提出的。作為一種關於地域空間的研究，Scott 引入垂直空間視角去觀察 Zomia 地區的政治、社會結構與歷史過程，他由個人及群體的能動性去解釋高地社會的政治體制，把作為歷史行動者的山地人群的「無國家」政治選擇作為理解高地人群的生存條件、生產與生計方式、價值體系和社會結構的出發點，建立一種關於山地區域歷史結構的解釋模式，顛覆了既有的國家史觀。Scott 的著作作用了一個頗具刺激性的標題——《不被統治的藝術：高地東南亞無國家主義者的歷史》作為書名，鮮明地表達了其顛覆「國家史觀」的用心，從高地人群的立場和能動選擇去論述高地社會與政體發展的歷史。這個標題在表達學術主張與理論特色上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也造成了一些誤讀，最常見的是以為他講述的是一個非國家化的歷史和沒有國家統治的區域和社會形態。其實，他從高地人群逃離國家的選擇出發的討論，非但不是呈現一個無國家的歷史過程，相反恰恰是由「國家效應」出發的一種分析立場，只是這種國家效應不是

從國家擴張與人群的被動應對來說明，而是把高地人群的逃離國家作為一種主動選擇和立場堅持乃至意識形態建構來分析國家效應在 Zomia 區域歷史中的展開。我以為，這種立場在方法論意義上，不只適用 Zomia 地區，也適用於其他國家建構已經廣泛滲入的地區，例如我們在這裡討論的南嶺山地。這個地區雖然也存在國家體系持續面對挑戰的空間，也存在從沒有中斷的逃離國家的政治選擇，但如果我們不是把南嶺山地的國家存在只理解為一般意義上的政治統治體制，而更多把國家存在看成是一個多層的權力和文化體系，那麼可以認為，南嶺地區長期以來一直是在國家體系下創造自身的歷史與文化的。

毫無疑問，南嶺在空間上不在 Scott 所圈劃的「Zomia」範圍，但其山嶺與 Zomia 地區直接相連接，是中國西南山地向東延伸出來的一條「陸梁」（借用辛德勇的說法）。不過，這片山地的人群，與 Zomia 地區的人群有非常緊密的聯繫，民族語言學家把嶺南地區土著的語言歸入苗瑤語系或壯侗語系，尤其是在南嶺山地中的瑤人，一般認為屬於廣泛分布在 Zomia 區域中的勉語人群。然而，與 Zomia 地區最明顯的不同，是這個區域從秦漢以後一直在中國歷代王朝設立州縣直接管治之下。前面講到的南嶺在地理上同時兼具「天地所以隔外內」與「為百粵數千里咽喉」的雙重角色，使其在中國的王朝國家體系中具有重要的位置。在這個意義上，南嶺也許是一個可與 Zomia 比較，並由此推進關於山地社會與國家擴張歷史認識的理論建構的一個實驗場。

南嶺山地中人群的生存情況和國家存在狀態，乍看起來有很多與 Zomia 相類似的現象，南嶺及其周邊連綿的崇山峻嶺，在相當漫長的歷史時期，也是大量如 Scott 所見的選擇「不被統治」的人群逃離國家的藏身之地。王陽明曾經描述這片山地是「政教不及，人迹罕到。」明代嘉靖《韶州府志》說這裡的「山谷之民，至今有老死而不見官府者，大抵土曠民稀，流移雜處。」^{〔三〕}明代江西巡撫陳有年描述粵東北與贛南之間的山地人群時說：「廣東惠州之和平、龍川、興寧，與潮州之程鄉、平遠，與贛州定南、龍南、長寧諸邑，犬牙相入其間，皆舊巢遺種，習染未除，平居負山阻峒，驕悍自恣，一有罪愆，官司繩之稍急，則呼叫躑躅而起。」^{〔四〕}類似的記載，在明清時期的文獻中俯拾皆是。這些文獻中所指的「舊巢遺種」和「流移雜處」兩類人，用現代的語言來表述，大致可以簡單理解為當地的土著和外來的移民，這些人相對於作為王朝編戶的「民」來說，可以認為不在王朝國家直接統治之下。

然而，如果只是簡單地將南嶺山地的人群視為逃離國家統治的人，潛在地隱含着南嶺歷史的解釋只是圍繞在「逃離」與「加入」國家，或國家「退出」與「擴張」的循環中兜轉，這樣一個反覆拉鋸過程的事實，雖然是在我們研究中不可避免要面對的議題，但只在這個議題中糾纏，就可能限制着我們對南嶺山地社會的認識，而我們對山地區域動態過程的研究也難以在更宏觀的層次上對中國歷史進程的解釋作出貢獻。

歷史文獻中關於南嶺山地的人群的指稱，無論是「舊巢遺種」還是「流移雜處」，最習見的是與「盜」、「賊」、「寇」這類概念相提並論，南嶺因此歷來被視為盜賊淵藪。這些盜賊的構成，用明嘉靖年間談愷纂《虔臺續志》中的說法，是「瑤僮洑焉，漁蛋伏焉，逋亡集焉，盜所由出也」。在這裡，我們看到當時的國家官員標籤和定義異己時習用的兩種話語，「瑤僮漁蛋」屬於人群和文化分類的話語，「逋亡」與「盜寇」則屬於王朝國家政治範疇的話語。在官員們書寫的文件中，所謂「舊巢遺種」

是在前一種話語下使用的概念，所謂「流移雜處」的人群則是在後一種話語下使用的概念。這兩種概念在明清文獻中，幾乎理所當然地與「盜賊」相提並論，而「盜賊」之名，更鮮明地是一種基於王朝統治的合法性與道德價值的話語。從這幾套概念的交錯疊用的文字記錄和歷史記憶出發，可以是理解和解釋這個區域歷史文化過程的一個切入點。

在中國文人的觀念和表述中，慣用族類的概念來區分和標簽在文化上和身份上不屬於王朝編戶（即所謂的「民」）的人群，用漢字書寫的文獻，都把南嶺以及嶺南地區的人統稱為「蠻」，並分別用多種族類名稱來標識之，這些名稱主要有「瑶」、「僮」、「僚」、「俚」、「瑋」、「徭」、「岐」等等。按比較通行的說法，現廣泛分布在南嶺地區的「瑶」，是原居湖廣溪峒間的蠻夷，後逾嶺而居溪峒；其他諸蠻則是舊越人諸種。^{〔二五〕}不過，這些族類名稱，並非這些人群的自稱，而是古代外來讀書人用來指認當地土著的他稱，每一種名稱也沒有精嚴的定義，同一名稱所指的可能是不同的人群，同一人群也可能用不同的族稱。當代的學者若拘泥於把這些族稱與現代民族識別劃定的民族分類等同起來，甚至沿襲過去的讀書人和統治者的話語，把使用文字的人貼在不使用文字的人身上的這些分類的標簽，認作有不同文化本質的人群的分類，即使提出看似紛紜的解說，仍不免膠柱鼓瑟。如果我們不是執着於這些標簽的種族屬性和文化本質，而是着眼於這些標簽在操控漢字書寫的讀書人觀念中的文化和社会意涵的話，就可能發現，文獻中出現的族群名稱的差異，隱含着南嶺及嶺南地區土著人群與王朝國家關係的微妙改變。

南嶺山地的土著，早期的文件中多稱「僚」與「俚」，清代以後則漸漸少見以至消失。對南嶺的瑶族有深入研究的李默先生，在討論廣東的瑶族源流時曾經提出，瑶族中包括了古代廣東的俚僚。他列舉了大量文獻，顯示出宋代以前的文獻用「俚僚」指稱的「嶺南原民」（李默先生用語），明清之後逐漸多用「瑶僮」之名，他把這個變化稱之為「瑶化」。^{〔二六〕}雖然他的討論關注的仍然是族屬和族類源流變化的問題，但從他的揭示的事實，看到這個「瑶化」過程，與其說是一個族群融合衍變更替的過程，不如說是一個在文獻書寫上呈現的「瑶化」過程。這個過程所表達的，是王朝國家對本地土著族群的觀感和認知變化，這種變化反映出國家政治控制和文化擴張，土著人群的身份與角色的演變以及相關的社會變遷的歷史。在文字書寫上以「瑶」、「僮」、「瑋」的名稱取代「俚僚」來指稱本地的人群，既不屬於國家編戶的「民」，又與古代的「俚、僚」有所區別，他們在文化上可能仍屬化外，但在身份上已納入王朝統治的秩序之內。因此，如果只囿於從「逃離」還是「進入」國家的二分法來分析南嶺山地的人群，是不足以由族群標簽與身份的改變去解讀這個區域的社會過程的。

明清時期文獻中所見南嶺山地中在州縣編戶之外的人群，主體是分布在山嶺溪峒中的瑶人。關於這些瑶人的文化與社會，崇禎《博羅縣志》有這樣一段簡要的描述：「椎結跣足，隨山散處，刀耕火種，採實獵毛，食盡一山則他徙，粵人以山林中結竹木障覆居息為峯，故稱瑶所止曰峯。自信為狗王後，家有畫像，犬首人服，歲時祝祭。其姓為盤藍雷鍾，苟自相婚姻，土人與鄰者亦不與通婚。瑶有長、有丁，國初設撫瑶土官領之，俾略輸山賦，賦論刀為準，羈縻而已。今瑶官多納授，從他邑來兼攝，亦不常置。」這段描述的後半段，清楚地顯示出瑶人并不是在國家之外的，但前半段所講的瑶人生存狀態，也會令我們聯想到 Scott 所謂的「逃跑農業」（escape agriculture）和「逃跑社會結構」（escape social structure）。這些居住在溪峒之中的過山瑶，

在過去也多依賴打獵和採集塊根植物為主要食物來源，即所謂的「採實獵毛」，用我們在南嶺山地調查時聽到當地瑶人的說法，他們過去是靠着一把鋤頭挖蕨根為食，在山嶺間不斷地遷移。他們每到一個山頭，都是用一把鋤頭，挖蕨根作食物為生，「食盡一山則他徙」，一地的蕨根挖完了，就到另一個山嶺去，仍然是挖蕨根為生，一代一代在不同的山嶺上流動。這種不斷遷居的生存方式決定了他們的家庭形式，現在七八十歲一代的瑶人，能够追溯的祖先一般不會超過三代，加上過山瑶的雙系繼嗣親屬制度，令到他們不太可能形成超出家庭規模的繼嗣群體組織。因此，過山瑶的社會基本上是一種家屋社會，以核心家庭為基礎，沒有形成基於血緣繼嗣分支的家族組織。

然而，在文獻上「瑶僮」的名稱逐漸取代「俚僚」的名稱，隱含着這些人群同國家發生關係的轉變。李默先生考辨瑶名時除確認「瑶」是他稱外，更指出「瑶」這個名稱有特定的涵義。他用宋明時期的資料闡發宋人周去非《嶺外代答》中謂「瑶人者，言其執徭役於中國也」一語。他認為宋代曾下令在嶺南招土人營田，「俚僚營田而為瑶」；元代則營田屯戍之蠻僚是為瑶人；明代有瑶兵制，嶺南俚僚之裔又化為瑶；因此嘉慶《廣西通志》釋「瑶」謂：「瑶者，徭也。粵右土著，先時就撫，籍其戶口，以充徭役，故曰瑶。」^[17]由此可見，「瑶」的名稱，在漢字書寫的語境下，其實是一個同王朝國家體制相聯繫的符號。從這個解釋出發，我們可以說，南方的蠻夷在宋明以後多以「瑶」稱，也就是所謂的「瑶化」，其實是南嶺土著溪峒之人（俚僚）被拉入王朝統治下的國家體系的過程。

這一看法，看起來與慣常的認識相悖。一些文獻記載提到瑶人時，常有「不事賦役」、「免其徭役」的說法，以致一般都相信「瑶」之名來自「莫瑶」之意。但其實，只有已經處在王朝統治體系之中，「免其徭役」才是一種有意義的優待。而且瑶人得此優待，是以其承擔其他義務為條件的，如充當峒丁瑶兵、承種瑶田、貢納方物等。明代瑶人中「有力者從藩司納銀若干，給割為瑶官，諸瑶聽其約束」，也是瑶人在國家體系中的一種方式。^[18]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南嶺地區，很多自稱是漢人的外來者獲得合法的土地所有權，獲得合法的編戶身份和定居權力，常常都會用頂承瑶田瑶糧的方式作為門徑。很顯然，把被稱為「瑶」的人群簡單視為「不被統治」的人群，是不能解釋這個族群與王朝國家的複雜關係，也容易導致對山地瑶人社會的誤解。在這個意義上，南嶺這樣的山地區域與Scott所描述的Zomia地區，在性質上有根本的區別。

與Scott關於Zomia的討論中揭示的情況相似，南嶺山地中的確有相當大量的人是從國家統治體系中逃出來的。明清時期的文獻很清楚記載，在山地中那些被稱為「瑶」的人，也有相當大的數量是從州縣編戶中逃離出來的。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南嶺山地，歷來都是逃離國家的人藏匿之區，「外為流寇竊入之門，而內為窮寇逋逃之路」^[19]這些逃進山中脫離政府直接管治的人，在官員和文人的筆下，常常被認作蠻。元代的時候，有云「廣東一道，為海上雄藩。南距海，北抵庾嶺，東接閩，西連雷化，地方數千里，戶口數十萬，瑶僚半之。近年以來，民化瑶僚之俗者又半，視禮樂者為迂闊，弄刀兵如兒嬉。苟撫字無方，則嘯山林，泛江海，相胥起而為盜」^[20]到明清時期，如清人吳震方《嶺南雜記》所說：「明通志凡山寇皆謂之僚，蓋山寇亡命烏合，未必種傳，無從究考」。清初屈大均也非常明白地指出，瑶人中，「其非盤姓者，初本漢人，以避賦役，潛竄其中，習